

乡土记忆 的审美视阈

—— 20世纪文化乡土小说八家
罗关德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乡土记忆 的审美视阈

——20世纪文化乡土小说八家
罗关德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土记忆的审美视阈：二十世纪乡土小说八家/罗关德.-天津：天津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4

ISBN 7-80688-201-4

I. 乡… II. 罗… III. 乡土文学-小说-文学研究-中国-20世纪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8816 号

出版发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项新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

邮编：300191

电话/传真：(022) 23366354 (总编室)

(022) 23075303 (发行科)

电子信箱：tssap@public.tpt.tj.cn

印刷：天津铁路分局天津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5

字数：190千字

版次：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定价：2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 容 提 要

中国 20 世纪的文化乡土小说是现代文学领域中的一种独特文学现象，它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观照方式，具有特定的文化历史内涵。本书从乡土小说家的叙述视角和心态着眼，厘定了文化乡土小说与乡村小说的界限。作者精选了 20 世纪极具代表性的八位文化乡土小说家进行个案研究与比较，用微观与宏观结合的方式，勾勒了 20 世纪文化乡土小说的整体走向和未来趋势。作者认为：鲁迅对乡土小说的界定抓住了这类作品的文化特质，即它指向的是东西方文化碰撞背景下，知识分子理性抉择与情感冲突的矛盾。因此它是一种文化小说或诗化小说。

本书适合于高校文科师生和所有关注多元化背景下人的生存境遇及其文化心态的读者。

目 录

导 论/1

- 一、20世纪乡土小说产生的文化历史背景/1
- 二、20世纪乡土小说的性质和特征/5
- 三、20世纪初期乡土小说的三种理论/21

第一章 鲁迅乡土小说的思想文化内涵/34

- 一、鲁迅乡土小说的文化批判倾向/36
- 二、鲁迅乡土小说的文化“皈依”梦幻/50
- 三、鲁迅乡土小说的叙事策略/56
- 四、鲁迅影响下的20年代“乡土文学”/69

第二章 茅盾乡土小说的社会缩型范式/82

- 一、茅盾乡土小说的社会批判立场/82
- 二、茅盾乡土小说的文化缺失/94
- 三、茅盾乡土小说的文学史意义/100

第三章 沈从文乡土小说的传统道德情怀/107

- 一、沈从文的乡村经验与乡村梦幻/109
- 二、沈从文乡土小说的道德情怀/113
- 三、湘西美好风俗的挽歌/121

第四章 赵树理乡土小说的民俗性及其政治化

倾向/125

- 一、赵树理乡土小说的民间文化立场/127
- 二、赵树理乡土小说的政治化倾向/133
- 三、赵树理民间文化立场和政治文化立场的和谐与矛盾/138
- 四、“赵树理模式”与“农村题材小说”的出现/148

第五章 汪曾祺乡土小说的道家情愫/161

- 一、汪曾祺乡土小说的思想文化渊源/161
- 二、无为自足的道家理想人格形象/168
- 三、淡泊自娱的道家精神境界/173
- 四、崇尚自然的道家风俗景观/181

第六章 韩少功乡土小说的视角迁移/189

- 一、政治视角的乡土反思和乡土重建/190
 - 二、文化视角的乡土批判和乡土寻根/193
 - 三、语言学视角的乡土还原和乡土认同/197
 - 四、人类学视角的文化反思和乡土怀旧/200
- 附：韩少功《暗示》的隐秘信息/205

第七章 莫言乡土小说的人类学视角/216

- 一、莫言乡土小说的“种”性意识/217
- 二、莫言乡土小说的民族化寓言/222
- 三、莫言乡土小说的文化人类学内涵/227

第八章 贾平凹乡土小说的美学流变/232

一、贾平凹政治视角的乡土写实小说的确立/234

二、贾平凹文化视角的乡土寻根/239

三、反文明的乡土怀旧/247

四、寓言：东西方文化碰撞下的新文化建构/253

主要参考书目/266

心灵：游走现实和彼岸之间(代后记)/269

导 论

一、20世纪乡土小说产生的文化历史背景

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说道：“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与持续。”^①认为：“五四运动中的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正如过去一百四十年中国历史中知识界所出现的很多其他现象一样，其所以产生，是因为有一个重要的事实背景，即西方文明的入侵。”^②西方的经济入侵和文化入侵改变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自循环模式，并使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遭遇到空前的挑战。从而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既定模式，把中国社会引向了西方化，或者说现代化的道路。因此，探讨20世纪中国社会的诸种问题，探讨20世纪中国的文学，乃至至于探讨20世纪中国的乡土小说创作，都不能忽略西方文化的因素。

从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过程上看，自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就在一种屈辱的状态下被迫向世界开放了。外国资本主义用大炮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国门，把中国引向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

^① 林毓生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② 林毓生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会。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入侵，亦使中华民族固有的价值观念受到了冲击。面对这一特定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知识界迫切需要做出文化的抉择，以适应形势，救亡图存。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知识界的文化思想经历了如下四个历史阶段的三种文化思想的演进：

1. 是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洋务运动

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南京条约》的签订，强烈地刺激了中国的文化思想界，也暴露了中国经济、技术，尤其是军事上的落后。于是，中国最早接触到西方新的文化思潮的南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把视野转向了西方。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率先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其着眼点主要在于发展军工业，制炮造船等。受林则徐等先觉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到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形成了高潮，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一大批掌握军政大权的知识分子是其代表。一时间，工业救国、商业救国、教育救国等口号沸沸扬扬。然而，客观上由于中国严重的落后状态，不可能使国力在短期内迅速地改变。主观上说，由于洋务运动发起者们采用的是“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从而大大限制了他们所能取得的实绩。尤其是一场甲午海战，彻底粉碎了洋务派虚设的梦想，使得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也随之破产了。

2. 是以政治改革为中心的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

洋务运动的失败，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救亡图存的深入思考，使他们把视点转向了政治体制的改革方面。客观上看，由于洋务运动的推进，扩大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西方的意识形态也逐渐得以渗透。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同时，在文化层面上也越来越认同于西方的民主制

度,从而意识到封建专制对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于是,以政治启蒙为核心的维新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思潮。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他们不同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而是主张推行“体”上的变革。从“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体制改革的热衷和向往。然而,由于他们并未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一场如火如荼的维新运动很快就被以慈禧为代表的政治实力派平息了下去。

维新运动的失败,唤醒了一部分先觉者的革命热情。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了推翻帝制的革命主张,力图建立共和制。然而一场辛亥革命运动,却由于民众的普遍不觉悟,致使袁世凯篡夺了领导权,从而只是在形式上实行了民主共和,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仍然没有被彻底摧毁。

3. 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标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曲折轨迹,同时也步步加深了中国知识界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历史的陶冶中逐渐对民族文化有了清醒的了解。意识到,只有改造中国的人文精神,彻底摧毁封建文化,才能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种意识状态下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彻底的否决。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说道:“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汗。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柢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以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

故。”^①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两面大旗,提出了全盘性反传统的偏激主张。对于有着几千年中庸传统的国度来说,全盘性反传统实在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批受传统文化熏染,有着深厚的传统国学积淀的知识分子,面对特殊的历史国情,尤其是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侵袭,毅然背弃传统文化,以彻底的反叛精神进行文化创新。这实在也是一种悲壮和历史的无奈选择。当时,那些在今天看来似乎更加理智、清醒的文化观念,像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虽然不乏公允、平正,然而对当时痼疾深重的中国社会却于事无补。而五四新文化运动者们的彻底性反传统的非理性主张,反而获得了知识分子整体上的认同。成为一个时代的价值选择。

今天,用理性的观点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表现出的彻底性反传统的偏激主张,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合理选择,原因在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先天地受到传统文化的浓厚熏陶,当他们在西方现代文明入侵的条件下接受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时,又必然地是以复兴民族文化为根本旨归的。加之西方文化的个性主义与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本质上的差异性,使得这一彻底反传统的主张,先天地带有不彻底性。诚如李泽厚所说:当他们“把这种本来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介绍输入以抨击传统打倒孔子时,却不自觉地遇上自己本来就有的上述集体主义的意识 and 无意识,遇上了这种仍然异常关怀国事民瘼的社会政治的意识和无意识的传统”。^②然而,正是这种客观上的不彻底性却矫枉过正地使全盘性

① 陈仲甫:《文学革命论》,引自张若英:《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上海书店印刷,1982年,第40页。

②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反传统的偏激主张获得了历史的合理内涵。

从情感的角度上看,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先觉的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着思想和价值观的两难矛盾,即他们作为中国文化的承传者,一方面他们继承了忧国忧民、兼济天下的文化传统,于是大胆引进西方先进的文化价值观念,力图以西方文化的引进实现中国文化的再度辉煌;另一方面,他们又最早意识到传统的中华文化的衰微,发现了西方文化的种种优势,于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否定,他们摇摆于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夹缝之间。这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鲜明、尖锐。中国文化大转型时期知识分子这种本土意识与外来意识的缠绕,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的纠结,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冲撞,势必造成他们在文化选择上和判断上的两难状态,用李泽厚的话说,表现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而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中国乡土文学最突出地表现出的正是知识分子在这种文化大转型时期的复杂矛盾心态。因此,从乡土文学产生的文化历史背景上看,20世纪东西方文化冲突是乡土小说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知识分子在变革社会中理性与情感的两难矛盾心态,则构成了乡土小说的主要表现内容。

二、20世纪乡土小说的性质和特征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上,我们有过清新闲适的“山水诗”,温情脉脉的“田园诗”,有过针砭时弊的“民间词”和“民间歌谣”,像王建的《雨过山村》:“雨里鸡鸣一两家,竹溪村路板桥斜。妇姑相唤浴蚕去,闲看中庭栀子花。”表现了充满清新气息的乡村自然景观、民间习俗和民间情感。像刘禹锡的《插田歌》,侧重于对乡民的农事、习俗的描绘,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对归乡人喜悦情态的描摹。然

而,像现代乡土文学那样表现出对乡土社会的强烈批判,或忧愤深广的乡土抒怀的作品却从未出现过。造成现代乡土文学与传统写乡村题材的作品的最大不同点在于,传统的乡村题材作品,尽管叙述人或抒情者都有对乡村社会有一定程度的疏离,然而,由于缺乏异质文化的观照,其情感和理性的落点一概体现为对乡村生活的向往和认同,表现为离乡则伤感,思乡则哀怨,归乡则“春风得意马蹄疾”。表现出同质文化环境中的怀乡之情。其情感是单纯的、明丽的。而现代乡土文学,由于渗入了西方异质文化的参照系,使得叙述者一元整合的文化心态泯灭了,从而表现出东西方文化共存的二元矛盾的复杂心态。这种不同文化元素的介入,尤其是西方先进的文化逼迫,使得20世纪的中国乡土文学,乡村已不再仅仅是人物活动的外在环境了,而是具有了民族文化的象征寓意,乡村与城市分别获得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表征。这使得20世纪的中国乡土文学具有宏阔的象征指向性和历史寓言性,作家笔下的乡村已不再仅仅只是实际的乡村,而是具有中国社会的喻隐性指涉。作家笔下的人物,亦在个性的基础上,具有“国民性”的典型化特征。也就是说,20世纪的乡土小说已是一种以乡村为载体的象征小说或寓言小说,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人物的诗化小说或文化小说,其主题具有知识分子寻找文化精神家园的意味。这使得20世纪中国的乡土小说具有丰厚的文化历史内涵。从本质上说,20世纪的乡土小说主要是指那种以乡村为背景,以农民为载体,表现东西方文化冲突境遇下,知识分子情感归属的一种小说样式,它是一种文化小说或诗化小说。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以知识分子为中心人物的文化小说

长期以来,人们对乡土小说的认识存在着一种极大的偏离,以为乡土小说写的是“乡”(农村),写的是“土”(农民)。故而“‘乡

土小说’可与‘乡村小说’”置换,“主要是从小说题材、人物及其故事发生背景上所作的一种限定。”^①这实在是把乡土小说等同于广义上的农村题材小说了。鉴于乡土小说在当代文学中的泛化,模糊了这一特定概念既定的文化内涵。本书提出文化乡土小说的概念,以区别于广义上的乡土小说。

乡土小说作为20世纪的一种独特文学现象,从它产生伊始就蕴含着特定的文化历史内容。严家炎就说过:“乡土文学在乡下是写不出来的,它往往是作者来到城市后的产物。”^②“城市”作为西方文化的象征,始终以文化的他者身份在乡土小说中或隐或显地表露它的存在意义,从而构成了乡土小说文化冲突的另一极。乡土小说之所以更多地选择乡村为背景,主要是缘于有着中华传统文明深厚积淀的乡村与以城市为表征的现代西方文明构成了文化冲突上两种差别巨大的生活环境。也正因为此,乡土小说家每每选择偏僻贫困的山区这一尚未被现代文明侵蚀的环境,以展示文化冲突的尖锐性,从而突现知识分子摇摆于两种文化冲突之间的强烈矛盾。张伟在谈及他的乡土小说时就说过:“乡村的东西更真切一些,变化少,新东西涌入一点也很快被溶解。比起城市来,它的力量更强大,更久长和悠远。这就更适合被拿来做依据,就像搞解剖要选个好的标本一样。”^③可见,乡土小说之所以较多地选择封闭、落后的乡村,往往是处于给文化冲突找一个“好的标本”的需要。

从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大背景来看,乡土小说显然与中西方文化冲突有着密切的同构关系。当“西方文明以各种不同的

① 范家进:《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1页。

②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

③ 张伟:《关于〈九月寓言〉答记者问》,见《问答录精选》山东友谊书社。

形式逐渐破坏了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而且在总的方面影响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方向”^①的时候,它势必造成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大转型时期世界观的斗争和价值观的复杂矛盾。尤其是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华弱势文化的一种野蛮入侵,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在理性上不得不认同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先天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濡染,以及目睹西方文明的入侵和西方文明本身所固有的种种弊端,又注定了他们以振兴民族文化为己任的价值选择。当这种文化矛盾已构成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传承者和代言人,必然地会在小说创作中表现这一母题。以鲁迅为代表的20世纪乡土小说家,正是在这一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开始了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困惑和情感失衡的叙写。也就是说,20世纪的文化乡土小说是在东西方文化冲突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以现代理性意识对乡土中国的文化批判和精神怀乡的一种小说样式。鲁迅的乡土小说理论突出地显示了其知识分子的特点。鲁迅说道:“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在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勃兰兑斯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②鲁迅的乡土小说理论显然侧重的是寓居在“北京”的知识分子,突出的是知识分子以城市为表征的现代西方文化视角对乡土的观照,突出

① 林毓生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②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见《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7页。

的是知识分子“隐现着乡愁”的胸臆。以往对鲁迅等乡土小说观的阐述往往只是机械地以题材(农村)和人物(农民)为中心,而未能看到乡土小说中知识分子的重要意义,这恰恰违背了鲁迅甚至称之为“侨寓文学”的初衷。显然,鲁迅的乡土文学观,既不同于周作人对“风土”、“地域色彩”的表层把握;也不像茅盾那样特别强调时代、政治的因素。客观地说,周作人的乡土文学观倡导的是具有“地域文学”倾向的乡土文学;而茅盾的乡土小说观对于“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的重视,^①使之与鲁迅的乡土小说观具有某种程度的暗合。但茅盾显然更强调的是在“特殊的风土人情描写”之外的“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②,他关注的是农民的现实命运,并一度以“农民文学”来命名。它为后来在宽泛意义上的农村题材小说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石。而鲁迅的乡土小说观,则把焦点对向了中西方文化冲突境遇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领域。尽管鲁迅、茅盾、周作人的乡土小说理论有着各自的侧重点,然而,他们却共同为20世纪宽泛意义上的乡土小说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础。从不同方面丰富了乡村小说的审美内涵。

20世纪的乡土小说随着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加剧,加之受到鲁迅乡土文学观的影响,特别是鲁迅创作实践的带动,从整体走向上看,越来越呈现出文化的蕴含,从而与茅盾、赵树理初创的,柳青、浩然等作家继承和拓展的农村题材小说越来越有了明显的区别。20世纪的乡土小说随着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深入,也越来越被知识分子(而不是农民)所青睐。这种文化乡土小说,在题材上已不再是农村题材所能包含的了。它逐渐向城市的胡同和里弄渗透(范伯群

①② 茅盾:《关于乡土小说》,见《茅盾全集》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先生就提出了“都市乡土文学”的概念)。在人物上也不仅仅是以表现农民为中心,知识分子已不再只是农民的代言人了。20世纪的文化乡土小说,把知识分子的理性意识和情感矛盾推到了小说的前台,着力展示的是中西方文化冲突境遇下知识分子自身复杂多样的精神状态。而单纯地写乡景、乡俗、乡情,以展示农村和农民的现实状况,展示平民乐趣的一种小说样式,那将是宽泛意义上的农村题材小说。当然,笔者不否认这些因素,以及方言的文化韵味,都可以构成文化乡土小说的必要(而不是必然)前提,但它并不是文化乡土小说的终极旨归。也就是说,它只是载体,而不是本体。鲁迅赋予乡土小说本体内涵指向的是知识分子在中西方文化冲突下的文化定位、文化漂泊和文化归属的范畴。它是一种文化小说,诗化小说。其实,从乡土小说着力表现“乡愁”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它的文化属性。乡愁并不产生于土生土长的农民,乡愁来自被故乡放逐的人们。而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和文化占有者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必然成为表现乡愁的当然代表。更何况乡土小说中的乡愁的“文化乡土”、“精神家园”的韵味,绝非是农民和其他身份的人所扛得起的。传统的阅读经验,往往忽视了文化乡土小说中叙述者的身份,而直接表现知识分子文化漂泊,精神漫游的小说又一度被拒之于乡土小说门外,这使得知识分子在乡土小说中的应有地位长期被悬置。而乡土小说的诗化性,写意性,亦使得一度只注重形象塑造的小说分析“忘记”了叙述人的心态。例如我们阅读鲁迅的单篇作品,确实容易忽视叙述人,尤其是叙述人的立场、态度、心境和表达方式,而把注意力转到了叙述对象上。然而,如果对鲁迅的文化乡土小说进行整体上的把握,那么,叙述者理性和情感的复杂矛盾心态就浮现了出来。我以为对于文化乡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也应作如是观。